

汉语方言文读的来源*

汪化云

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

提要 汉语方言中的文读不仅可以来自共同语或外方言音类的叠置,也可以来自本方言。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和移民,导致一般方言的音类在权威方言中叠置,可以使权威方言的相应音类成为文读;离散式音变导致本方言口语中出现新读,相应的保守的读书音也可以形成文读。

关键词 汉语方言、文读、来源

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是语词中能体现雅/土这种不同风格色彩的音类差异”(徐通锵 2001:383)。文读具有“雅”的色彩,一般认为来自“外方言、主要是权威方言音类在本方言中的叠置”(徐通锵 2001:385)。不过,也有少数学者对文读的来源提出过不同的看法。王临惠(2006:62)在论及临猗方言的文白异读时就曾指出:“无论其文读还是白读,都有自身演变和受到外来影响的因素。”然而,由于不是专文讨论文读的来源,这类看法大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论证。我们认为,汉语方言中的文读除了来自“外方言、主要是权威方言”以外,还可以来自本方言——所谓“异读”,即某些汉字出现了另外的读音。这另外的读音可能来自共同语或其他方言,即发生了叠置式音变(徐通锵 2001:389);也可能产生于本方言内部,即发生了离散式音变(徐通锵 2001:274)。而无论哪种形式的音变,都可能导致相关语词色彩的文白差异,都可能导致文读来自本方言。以下以部分方言为例试申述之。

一 叠置式音变中本方言读音可以成为文读

所谓“叠置式音变”,指的是“不同系统的同源音类的叠置”(徐通锵 2001:389)。如上所述,叠置式音变导致的文白异读,其文读一般是外来的,主要是通过教育和文化的途径进入方言的。但是,叠置式音变中还存在人们讨论不多的另一种情形:一般方言音类在权威方言中的叠置。这能够导致文读产生于本方言,可以分为两类:

1、方言间的相互影响,使得一般方言少数有特色语素的读音在权威方言中叠置,导致文读产生于本方言。例如北京方言中“搞(搅)、尴尬”读 kau²¹⁴、kan⁵⁵ ka⁵¹ 是白读,分别是长江流域中部方言和吴语字音的叠置,其相应的文读则来自北京方言本身(李荣 1965)。

2、移民方言的音类在原住民的权威方言中叠置,导致文读产生于本方言。如果移民人口在移入地占多数且方言内部比较一致,而原住民方言是权威方言,移民和原住民方言又存在某些音类读音的差异,那么移民一方面因群体的优势而使用自身方言的音类,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使用原居民方言中该音类涉及的书面语词读音,从而使相应的语素形成异读。原住民在

* 本文初稿曾在第四届官话方言国际研讨会(2007,陕西安康学院)小组宣读,王福堂先生、麦耘先生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会后作者据以对拙稿进行了修改,谨此致谢!

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使用本方言的音类，但在日常生活领域又不能不在音系许可的范围内接受移民方言的影响，从而使相应的语素也形成异读。移民方言与原住方言互相影响，势必使异读在原住方言中固定下来。一个方言中同一语素的异读并存，不可能毫无差异。从使用领域来看，这种差异只能是文白之别：移民方言的音类表现出“土”的风格色彩，是为白读；原住方言的相应音类表现出“雅”的风格色彩，成为文读，即文读产生于本方言。

汉口方言就存在这种现象。朱建颂(1992:6)把J.A.Ingle的《汉音集字》(1899)和赵元任等(1948)的著作进行比较，认为汉口方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tɕien、ɕien、ien的一部分字分化出白读kan、xan、ŋan，包括中古咸、山摄开口二等见系的一部分字，如‘艰间中间拣间间隔’等有tɕien文 kan白两读，‘鹹陷馅’等有ɕien文 xan白两读，‘淹雁晏’等有ien文 ŋan白两读。”这就是说，这些字在《汉音集字》中只有声母为tɕ组的一读，在1936年出现了声母为k组的另一读，两读具有文白的差异。但是，其“分化出白读”的说法不能成立。在汉语史上，见系开口二等字的声母是由k组向tɕ组发展的，反过来的“分化”不大可能发生。我们认为，汉口方言上述文读应该是固有的，其白读则是移民方言的叠置造成的。要证明这个观点，必须证明以下两点：第一，J.A.Ingle(1899)和赵元任等(1948)的材料可靠，上述文白异读的从无到有是事实，且汉口音系没有被外来音系替换。第二，汉口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存在足以影响当地方言的移民，而移民方言中上述见系字读k组声母且可以被汉口方言接受。

首先说第一点。《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汉口方言的材料是吴宗济1936年5月5日在当地搜集的，其记录的文白异读字数不多。但是，以赵元任、吴宗济的能力，其对这种现象记录的可靠性是无可怀疑的。《汉音集字》是一本汉口方言的同音字汇，作者J.A.Ingle是美国人。该书引言中介绍，其写作目的是帮助美国在汉口和武昌的基督教会成员“听懂汉口话”。其写作借鉴了W·Scarborough牧师的《汉口方音字表》手稿，书稿经过了其汉语老师张亲承的审核。所以朱建颂(1999:289)认为，该书“是经过多人核实的方言记录”。可见，这两份文献材料可靠，上述文白异读的从无到有是事实。至于汉口方言的音系，朱建颂(1992)指出其在1936年只出现了少数字读音的改变和少数异读，并没有发生被其他方言音系所取代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上述文白异读确实是在汉口方言音系中发生的。

再说第二点。据吕寅东、李哲暹《夏口县志·丁赋》(1920年)记载，光绪十四年(1888年)汉口镇人口仅18万，到1920年竟增至120万，32年增加了近6倍。这与张之洞1889年督鄂和辛亥革命后汉口的快速发展有关。其增长的人口主要是来自周边各县的移民，“以孝感黄陂黄冈人最多”(余炳贤1997:159)，即移民主要来自江淮官话黄孝片。这么多来自同一方言片的移民，其方言、文化不可能不对汉口的原住民产生影响。事实上，随着移民的大量进入，其原住地的黄孝花鼓戏也在汉口流行起来，主要用黄陂话、兼用汉口话演唱。黄孝花鼓戏的蓬勃发展，使之在1926年被正式定名为“楚剧”(余炳贤1997:159)。既然移民可以导致楚剧在汉口与当地的汉剧并存，那么移民方言的音类在汉口方言中叠置也是可能的。而上述咸、山摄字1936年在江淮官话黄孝片也存在类似的文白异读，但以白读为主，如“鹹陷馅晏”等字在黄陂、孝感以及黄冈所辖9县方言中，一般只读k组声母(赵元任等1948)。从文白异读由“文弱白强”到“文强白弱”发展的一般趋势(徐通锵2001:389-392)来推测，在移民开始大量进入汉口的19世纪末，这类字只读k组声母的应该更多，势必叠置于汉口方言。汉口方言则本来就存在k组声母(朱建颂1992:42)，接受移民方言的影响不存在音系障碍。

既然1936年在汉口方言中确实出现了文白异读，且白读不可能分化自文读，而移民方言音类在汉口方言中的叠置又是可能的，那么上述白读就应该是移民方言音类的叠置，其文读则应该是汉口方言相应音类地位的提升。随着移民方言逐步被汉口方言同化，白读作为移民方言的底层仍存在于汉口方言之中，从而造成了朱建颂所说的“分化出白读”的假象。

外来方言音类通过移民等途径叠置于权威方言，成为白读，那么权威方言的相应音类成为文读，就是顺理成章的。据赵庸(2007)报道，现代杭州话的白读也是来自周边方言的叠置，而文读来自杭州方言自身。可见，叠置式音变中本方言的读音可以成为文读。(当然，这种文

读也是来自权威方言，但它是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

二 离散式音变中本方言读音可以成为文读

所谓离散式音变，是“音系内部音类之间的分合变化，变化前后两个音类是一种变的关系”，其音变“在语素中是一个一个地进行的，所以在言语社团中的读音相当参差”（徐通锵 2001:400、281）。这当然会导致在一段时间内某些语素的两个读音并存。但是，徐通锵(2001:401)认为，两个并存的音类“跟不同的风格色彩没有任何关系”，即离散式音变不会导致文白异读。不过，陈重瑜(2002)却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中古入声字在北京音系里的一字多读……是新旧音重迭的过渡现象”，其旧音是文读，新音是白读，文白的差异是系统内部变化速度参差的结果。显然，这是离散式音变导致了文白异读。陈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历史情况大致如她所述”（叶宝奎 2006:39）。这说明离散式音变可以导致文白异读，可以导致文读来自本方言，湖北东部团风方言的事实也支持这一看法。

汪化云(2000:59)曾报道过古入声字在团风方言中的文白异读，有些字(主要是中古全浊入声字)今文读为入声 213 调，白读为阳去 34 调。这类异读在不同的人中“读音相当参差”，存在的数量不一，但下列汉字的异读是比较一致的：

| | | | | | | | | | |
|---|---------------------------------|-----|---------------------------------|--------|---|----------------------------------|----|---------------------------------|------|
| 擦 | t ^h a ²¹³ | 擦背 | t ^h a ³⁴ | 用粗刷子擦洗 | 食 | s ₁ ²¹³ | 食品 | s ₁ ³⁴ | 猪食 |
| 扑 | p ^h u ²¹³ | 扑灭 | p ^h u ³⁴ | 扑上去 | 铁 | t ^h ie ²¹³ | 打铁 | t ^h ie ³⁴ | 铁铁子重 |
| 戳 | t ^h o ²¹³ | 性行为 | t ^h o ³⁴ | 戳破 | 择 | tse ²¹³ | 选择 | t ^h e ³⁴ | 择菜 |
| 直 | t ₁ ²¹³ | 直接 | t ₁ ³⁴ | 直活简单劳动 | 夺 | to ²¹³ | 夺取 | t ^h o ³⁴ | 夺下来 |
| 毒 | təu ²¹³ | 毒药 | t ^h əu ³⁴ | 肉毒易感染 | 膊 | po ²¹³ | 赤膊 | p ^h o ³⁴ | 赤膊儿 |

按照一般关于“文读、入声”的观点来看，这个现象是矛盾的：入声在团风方言中也是走向消亡的现象，其入声调的字在不断减少以及一些字旧读入声、新读其他调类就是证明；而文读一般认为是新兴的读音，“入声”和“文读”难以共存。要解释这个矛盾的现象，就必须考察团风方言古入声字演变的原因。据汪化云(2000)研究，导致该方言中部分古入声字读作其他几个调类的原因，既有普通话和武汉方言影响的因素，也有该方言自身的因素。上述古入声字在团风方言中的阳去声读音，无论是其调值还是调类，跟普通话或武汉方言都不相同。显然，这种读音的产生与外来影响无关，而只能是该方言内部因素导致的变化。

影响团风方言的古入声字读作阳去声的内部因素，主要是轻声的读法。团风方言的轻声，是“自主的轻声”（汪化云 2003）。其入声的调值为 213，读轻声则失去曲折为 23 短调，调值近阳去 34 调。如“蹑、密”单念入声，在“糟蹑、挤密轧密”中就都读得像阳去声。这当然会影响到古入声字向阳去声的演变。“戳乏伐筏阙罚师春米折~本活穴薄核枣~斛雹犊熟整嫉”等古入声字在该方言中都读阳去声，当与上述影响相关。而前述文白异读中的白读阳去声，显然也是受了入声字轻读的影响。此外，“踏 t^ha²¹³/t^ha³⁴、惑 xue²¹³/xue³⁴、特 t^he²¹³/t^hie³⁴、啮 nie²¹³/ŋe³⁴”等字文读入声、白读阳去声，可能有普通话影响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入声字轻读的影响。又，该方言有少数古入声字文读阳平 21 调、白读阳去 34 调：

| | | | | | | | | | |
|---|---------------------------------|----|----------------------------------|------|---|-------------------|-----|--------------------------------|--------|
| 袱 | fu ²¹ | 包袱 | fu ³⁴ | 袜子毛巾 | 拔 | pa ²¹ | 拔河 | p ^h a ³⁴ | 拔鞋 |
| 嚼 | t ₁ io ²¹ | 咀嚼 | t ₁ iau ³⁴ | 嚼不动 | 贼 | tse ²¹ | 卖国贼 | t ^h e ³⁴ | 贼脚贼的窝点 |

这也与入声字的轻读有关：受入声字轻读的影响，这些字产生了阳去声的白读，而入声的读法成为文读。但是，普通话和武汉方言调类的影响，使得这些字的文读又演变为阳平声(有连读变调影响的因素：团风方言 213 调的入声，在阴去、阳去、入声字前构成两字组时失去升尾，变读为阳平 21 调)。少数人中这些字还残存着文读入声，就证明了这一点。

不难看出，团风方言中上述古入声字的文白异读、轻声读法、读阳去声的现象，除了文

读阳平的以外，应该是离散式音变的表现：在轻声读音的影响下，一部分入声字完成了向阳去声的调类演变。一部分入声字处在入声、阳去声两读并存的阶段，其音变尚未完成。与口语中轻声读法相关的阳去声读音，显然带有口语色彩，是为白读；相应的入声读音是原有的，一般存在于口语少用的文化语词中，显然带有“雅”的色彩，是为文读。大部分入声字则维持着一个调类，只存在语流中的临时变异。因此，对前述“矛盾”现象的恰当解释是：这是离散式音变中的现象。与一般文读的“外来”和“新兴”不同，其文读入声是本方言固有读音的沿用，白读才是口语中新出现的语音演变。这种离散式音变导致了文读产生于本方言。

刘勋宁(2003:1)曾指出：“清涧话口语保留入声，可是‘六’‘肉’二字日常都是说去声，只有在‘六畜兴旺’和中草药‘肉桂’当中读入声……这两个字的入声读法出现在书面语或者文化语中，应该是文读”。这个现象与团风方言上述文白异读相似，应该也是离散式音变的产物。这也证明离散式音变可以导致文读产生于本方言。

三 小结

不可否认，汉语方言中的文读主要来自外方言。但是，上面的讨论说明，文读也可以产生于本方言：外来音类作为白读叠置后，本方言的相应音类可以上升为文读；在口语中新读的反衬下，本方言中相应的保守读书音也可以成为文读。

至于文白异读的前途，我们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文读代表语言发展方向而白读代表传统的，其文读可能战胜白读，例如汉口方言中上述见系字的文白异读。文读代表传统而白读代表发展的，其白读可能战胜文读，例如团风方言上述入声字的文白异读。当然，还可能第三种情形：“一字两读各有其特定的词义范围……将长期互补地共存下去”（陈泽平 1998）。

参考文献

- 陈泽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陈重瑜. 2002. 〈北京音系里文白异读的新旧层次〉，《中国语文》6。
李荣. 1965. 〈语音演变的例外〉，《中国语文》2。
刘勋宁. 2003. 〈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语言教学与研究》4。
汪化云. 2000. 〈团风方言入声研究〉，《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
汪化云. 2003. 〈自主的轻声与非自主的轻声〉，《语文研究》1。
王临惠. 2006. 〈论山西临猗方言曾开一人声字韵母的文白异读〉，《语文研究》3。
徐通锵. 2001. 《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余炳贤. 1997. 〈漫谈楚剧与茶〉，《农业考古》2。
赵庸. 2007. 〈杭州话的文白异读〉，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1。
赵元任等. 1948.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
朱建颂. 1992. 《武汉方言研究》。武汉出版社。
朱建颂. 1999. 《汉音集字》疏证，载黄群建主编：《湖北方言文献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

Origins of Literary Reading in Chinese Dialects

Wang Huayun

Abstract Literary reading in Chinese dialects does not only come from the Mandarin or authoritative dialects but also from the dialects themselves. As a result of migration and influence of dialects, the pronunciation of a dialect overlaps with that of an authoritative dialect, and thus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authoritative dialect becomes a literary reading. The gradual change of pronunciation led to a new pronunciation in spoken dialect, and the conservative pronunciation became a literary reading.

Keywords Chinese dialects, literary reading, origins